

中共一大 13位代表的迥异人生



毛泽东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如今，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都已过世。追寻他们的人生足迹和思想历程，从中探求人生的价值，寻觅历史发展的轨迹，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成为后人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



何叔衡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何叔衡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而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刚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到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



董必武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董必武是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的代表。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来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



陈潭秋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陈潭秋不仅是武汉的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同时已是著名的学生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在江西、中国东北、江苏等地做党的工作，曾被捕入狱。

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化装同行，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粮食部长。

1935年7月，陈潭秋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中央电示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并担任我党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



邓恩铭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邓恩铭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

邓恩铭出生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大革命失败后，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

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

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是较活跃的青年。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

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王尽美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王尽美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

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陈炯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

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

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李汉俊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血染刑场，被敌人所害。但此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

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陈炯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

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

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李达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人并不多。

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

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

1931年，包惠僧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1936年转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至1944年。

1944年夏，国民政府缩编时，包惠僧看透黑暗，加上终不得志，便自动申请遣散。获批准，携眷到澳门谋生。

1967年，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从此之后，他就笔耕不止，写下了大量历史回忆、最后归结《包惠僧回忆录》。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病久治无效去世。

“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



包惠僧
陈独秀指派出席一大会议

包惠僧当初是武汉党小组领导人。包惠僧出席一大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陈独秀参加会议，并负责向陈汇报会议情况的代表。

革命低潮时期，他回到上海。上海是白色恐怖，苦闷、灰心、失望跃上心头，加上在党内有张国焘的处处责难，他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

1931年，包惠僧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1936年转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至1944年。

1944年夏，国民政府缩编时，包惠僧看透黑暗，加上终不得志，便自动申请遣散。获批准，携眷到澳门谋生。

1967年，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从此之后，他就笔耕不止，写下了大量历史回忆、最后归结《包惠僧回忆录》。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病久治无效去世。

“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

“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



刘仁静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在一大会议上，刘仁静极力反对西欧社会党的议会政策以及改良派思想。

1926年，受中央派遣，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料，他在学习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1927-1928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看过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同意他的观点。”

1929年，刘仁静拜见了托洛茨基，此后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

1939年，刘随着国民党三青团机关撤离武汉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回到上海，进入特务刊物《和平与统一》担任主编。刊物停办后，又辗转于国民党各个机关。

1961年下半年，组织上安排他到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直到退休。

1987年8月5日凌晨，一位司机因刹车不及，撞死一名老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1987年8月5日凌晨，一位司机因刹车不及，撞死一名老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1987年8月5日凌晨，一位司机因刹车不及，撞死一名老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张国焘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运动序幕。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劣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在苏联。不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

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

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并面见蒋介石，决意叛党。

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入汪逆门下，从事反共活动。

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

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

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



陈公博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陈公博是广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

此后，他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

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陈公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回国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年之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

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院长及军事委员会训练部部长要职。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仓皇逃到日本。随后，国内掀起惩治汉奸的浪潮。陈被送回南京。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6月3日，将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

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陈公博罪恶的一生结束了，时年54岁……

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陈公博罪恶的一生结束了，时年54岁……

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陈公博罪恶的一生结束了，时年54岁……



周佛海
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1921年，周佛海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学，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为生活所困而沉沦。

1924年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

周佛海一脱党，便马路上上反共道路，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然而，蒋介石的重用未能满足周佛海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汪精卫一见如故，共谋“和平”。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政府作鸟兽散。

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伪上海市长一职表示将汪完整交给国民党。

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周被判处死刑。

周佛海的婚外恋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

周佛海的婚外恋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

周佛海的婚外恋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



一大会议 快报记者 路军 摄

中国·世界：历史上的那几天 (1921.7.23-1921.7.31)

那一天，高尔基向世界求助

7月23日至31日这9天里，毛泽东等人在讨论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但任何历史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当时，苏俄陷入了饥荒，德国希特勒当上了纳粹党党魁，美国内阁要工外谋称霸，日本人则开始加强在百大平洋海域的控制力。列强虎视眈眈，中国国内是一片军阀混战的局面。

快报记者 石磊

饥荒使3350万人受灾。在一些地区，每天都能看到有人饿倒在路上。

美国内闹罢工外谋称霸

虽然提供粮食帮助苏俄渡过难关，但美国自己也好不到哪去，国内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的罢工行动愈演愈烈，总统哈定最后不得不出面调解。

通过1921年7月23日至30日出版的《申报》，美国当年国内罢工行动的历程可以较为清楚地显现出来。此时，美国总统哈定

快报记者 石磊

终于坐不住了。他决定和共产党领袖开会，草定结束铁路罢工的办法。

虽然被罢工闹得有些狼狈，但哈定并没有放弃插手国际事务。早在7月8日，他就指示国务卿查尔斯·休斯向英、日、法、意、中五国非正式建议召开会议。会议名称为限制军备、远东及太平洋问题会议。因举行地是华盛顿，故又称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期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是美、英、法、日《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也称《四国条约》。该条约

快报记者 石磊

生效之日，即是英日同盟废除之时，这不仅使美英关系得到了调整，也迫使日本接受美国提出的海军力量比例。

国内很乱，政府穷到极点

为了不撤出山东半岛，日本甚至搬出了“担心赤化”的理由，事实上，当时中国国内的局势很是混乱，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战事和部队因拿不到军饷而哗变的消息。

1921年7月26日，《申报》便刊出了陕军第一师第二混成旅闹

快报记者 石磊

的“调查报道”，尽管这是一起被“误传”的哗变，但士兵难领到军饷仍是不争的事实。

国内很乱，政府穷到极点

为了不撤出山东半岛，日本甚至搬出了“担心赤化”的理由，事实上，当时中国国内的局势很是混乱，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战事和部队因拿不到军饷而哗变的消息。

1921年7月26日，《申报》便刊出了陕军第一师第二混成旅闹

快报记者 石磊

的“调查报道”，尽管这是一起被“误传”的哗变，但士兵难领到军饷仍是不争的事实。

国内很乱，政府穷到极点

为了不撤出山东半岛，日本甚至搬出了“担心赤化”的理由，事实上，当时中国国内的局势很是混乱，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战事和部队因拿不到军饷而哗变的消息。

1921年7月26日，《申报》便刊出了陕军第一师第二混成旅闹

快报记者 石磊

的“调查报道”，尽管这是一起被“误传”的哗变，但士兵难领到军饷仍是不争的事实。

国内很乱，政府穷到极点

为了不撤出山东半岛，日本甚至搬出了“担心赤化”的理由，事实上，当时中国国内的局势很是混乱，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战事和部队因拿不到军饷而哗变的消息。

1921年7月26日，《申报》便刊出了陕军第一师第二混成旅闹

快报记者 石磊

快报记者 石磊